

披着兔皮的瘦弱老虎

红笔

——评《豪爽女人》

张娟芬八十四年三月八日至十一日于中时发表的「社运观点的情欲对话」，把蔓延数月之久的情欲战火烧到了社会运动上。这篇文章提出了作为实战演练的「女人情欲自学方案」；也提出了要一方面发展情欲经验分享团体，一方面靠多种社运的连线，来丰富豪爽女人的养成所需的「物质基础」此类观点，并且十分细致地论述了其所认为的「退无可退的情欲现实」、「发展情欲的必要性」、「女人情欲的发展不可能不挑战到 有的性别权力关系」，以及「女人共同的『物质处境』」、「姐妹盟约之必然」等。

以下的文字，便是来自妇运之外的其他运动中之女性，对这篇文章的质疑及意见。

（一）为何谈性压抑与性解放？

是在什么基础上谈的呢？

「性」其实并不具有什么本质上的意义，它是在文化、历史过程、及整体社会关系中所互动而型塑成的。在我们评论或对其作出价值上的判准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都是经过一番复杂的过程所形成的。

张娟芬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管在台面上呈现的是悲情还是快乐、希望，在台面下无非是个情欲流窜的『偷情都市』。」

然而，就哪些人来说是如此呢？城市幽暗的底处，有出于部落经济败、家庭生活困难而被迫卖身的原住民娼妓，有在新公园或市场猪肉摊上暗夜寻慰的男女同性恋（他们可不若台北市文化圈那些身兼「进步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同性恋者那般，拥有好的社会位置），在他们身上是无数权力关系、种族歧视、阶级支配满布的社会网络。而在工厂里、后段班的学生中间，在台北以下的台湾各处，性又是如何被实践的呢？作为「社运观点的情欲对话」，张娟芬并没有告诉我们：就整体社会关系而言，「性」在其间展现了什么意义？何以豪爽女人这样形式的「性解放」是现在的妇运对 有性别权力关系的挑战中具颠覆力量的？在特定的分析里，或许有必要将性关系

置于主轴，但就「社运观点」而言，张娟芬却没有作出在这个前提之下，把性关系抽离或凌驾其他社会关系之上来诠释其与妇女解放和他种社运的关系之基础为何。它是怎样被提到社会改造的日程表上？

即便拉回「性解放」这个主题，它也可能是让异性恋婚姻关系中的性更适意一些的「解放」，或者，成为在无数经济利益及文化消费包围下，被重新建构的产物。例如，「女人情欲的自学方案」里所建议的海蒂性学报告、翻译罗曼史、城市气息浓厚的岛屿边缘《妖言》系列。比起这些，诸如露骨的客家山歌所展现的情欲文化，原住民以及种种不同社群的情欲文化，难道不更应该本土妇运情欲解放论述的纵深？还是，因为它们与城市情欲不同，所以就不能归为「情欲」且必然是压抑的呢？我们实在不解，号称「培养自发的情欲想像」的「社运观点情欲对话」，为什么认为，透过阅读翻译罗曼史、第一世界的性学书或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刊物，来「学习」情欲「自主」，会比这些富生命力的方式来得值得提到运动的策略上呢？再者，是否

对性说「是」，就代表对权力说「否」？种种借由性来作为交换媒介的异化（它们不一定只是金钱），或由性关系中展现的压迫，难道会因为两造同意且没有身体伤害，就得以消除吗？

虽然，从压抑、揭密的角度来谈论「性」，带来出口反对现存种种权力的快感，但，也不能以此回避其间种种问题所在。

（二）这样将情欲置于中心，并由此强调「女人共同物质处境」的妇运论述，有什么危险之处？它为谁服务？

「我花了不少力气来说明退无可退的情欲现实，……我们不必去想如何消弭女人与女人的竞争，而应该想，如何使得这竞争不损及姊妹盟约；这才是重点。女人若能正确认识到其物质处境，当知她确实因为身为女人而被压抑，即使其他条件的优越（例如碰巧有钱、碰巧聪明）可以帮助她平衡性别上的劣势，也不能磨灭这个事实：因为她是女人，所以被压迫。正是父权统治下女人的共同物质处境，使得姊妹盟约可能，而且必须。当此共同的物质

处境被一步步清楚揭露时，姊妹盟约甚至将成必然」。（摘自张文）

以上这段说，如果我们把「退无可退的情欲现实」，置换成「台湾人出头天现实」，「女人」置换为「台湾人」，「性别」置换为「族群」，「父权统治」置换为「中国沙文主义压迫」，这是一段「文字上的巧合」呀！

事实上，「台湾人」、「女人」这样的差异概念本身是不存在对立面的。是物质关系上的支配及其过程创造了对立，而非差异衍生宰制关系、权力关系。主流意识型态告诉我们自然差异是支配关系的起点，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地欲为其压迫作一番合理化而已！厘清这一点，我们就能认识到：女人间的差异和类同，同等重要。妇女虽是集体地受到压迫，却非统一地。并且，阶级、族群、性别，在整个历史与社会的种种压迫关系里是交互穿透的，无法彼此化约或抽离。诉诸于男女自然的生理差异作为女人联结最理所当然的先验基础，从而建构起由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的统一性，再生产并正当化「存意识型态的论调（如「女人投女人的票」也是一例），虽然嚷嚷着要进行社会改造，要推翻资本主义体制，但充其量也只是作一番性别政治态度上的自我慰藉和道德粉饰罢了！

而这样的情况并非偶然而生的，她们对妇女解放提出这一番见解，除了不自觉地受到自身阶级性质的制约之外，也自觉地使用此一位置：他们并非执行阶级压迫的显明主体，而多数时候是分润者的角色，来掩盖其不愿放弃参与掠夺的好处之事实。她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不是因为并非直接拥有生产工具或财富，而是因为仍处于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来分享掠夺成果，才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女人与女人间的生存厮杀，不单单只是作为女人这个身份而进行的。

对踩在众多不论男人或女人的肩膀上，一路爬上好社会位置的女性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小资产及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妇女、年轻女性而言，诉说她们苍白的处境如何需要性解放或发展情欲，成为「共同需要」、「退无可退」；如此将女人抽象化、概念化，并将自己塑造成弱勢者，来掩盖她们和被踩在她们脚下的妇女不同之容貌，也是因为她们需要逃避说出妇女受压迫的真正根源，并由此导出基于「姊妹情谊」必须放弃即得利益的答案。「低阶层妇女缺乏好的社会位置与社会网络，所以性解放运动无法立时吸引她们加入，这是对的。不过所有社运都会有类似的局限，例如：性工作者的

劳动在父权社会中连基本的正当性都付之阙如，遑论工作条件的保障、职业伤害；所以致力于阶级解放的工会运动无法立时召唤她们站出来、争取组工会的权利。这局限来自于：弱势者承受的压迫常常是多重的，任何单一的社运都无法毕其功于一役；要突破这局限不能只责怪单一的社运，而是要靠多种社运的连线」（摘自张文）。豪爽女人提出「外遇」、「第三者俱乐部」之类的说法，却毫不反省，它或许就和娼妓制度一样，只起着补充家庭制度存在的弹性之功用；她们为父权文化下被压抑的同性恋情欲表达若有的微弱支持，却不敢直视；只有异性恋婚姻家庭在资本主义中所承担的「无偿剥削妇女劳动及再生产劳动力」之功能，这根最敏感的物质神经被挑战了，才有最大的（虽然不是唯一的）颠覆力量。因此，她们只对社会改造作一点形上学的思考，把既存体制看作静止的单片复合巨兽，各自独立、相互并列的各种社会改造运动也就不存在什么深刻复杂的关系，而只不过是具有某些主题上的不同，具有某些相同或相异的特性罢了！也因此，根据论述的需要与目的，随意「调整」阶级运动的认识观（简化为「组工会」等），而得以抹杀左翼理论中对妇女解放的观点于空白、化约。

（三）结语

在理论上厘清妇女受压迫的不同处境及其根源，不单只是为了寻求认识上的正确，更是为着血肉之躯承受压迫的同时，若非认清矛盾的复杂样貌，便难对抗无所不在的宰制力量及其不断变换的形式。如果我们也随着「比较复杂分析，可能比较精致，可能看得懂得人会更少；而且复杂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转化为行动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了」（摘自张文）的说法起舞，我们便放弃了真正彻底的改造所需的高度自觉，更自我否弃了解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被压迫历史之必要。这些压迫机制是先于个人当下的存在之前，便已不断发展着的。有积极意义的理论工作是为了明示经验从何而来，如何与参与建构它们的各种权力、支配关系发生连系，并提出转化之可能而生产的。

同时，我们也别忘了，中产阶级妇运也一直在细致地、有选择地建立起她们自己的认识与世界观，让被踩在她们脚下的其他妇女继续为她们的茁壮服务。当我谈及物质基础时，不仅仅指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有以思想、意识形态形式表现出来的物质关系。在台湾社运一片低潮时，中产阶级

妇运论述，是凭借着她们与旧文化、旧意识型态（那儿有许多她们不需质疑、辩难即可使用的现成东西），以及旧的物质关系（阶级或族群上的强势位置）无数量的连系，才得以欢庆嘉年华，她们也不想动摇到根本上，因为那是她们所无力面对的（如：这两年中小企业、劳力密集产业大量解雇女性劳工的问题）；更不是在同旧社会一步步决裂的火焰中，锤炼出比其他社会改造运动显得丰硕的成果。从根本的改造意义上衡量，左派女性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以真名称呼实物地说：「你们不是我的姊妹，只是一群披着兔皮的老虎，名曰：『豪爽女人』。」

诚然，将妇女解放视为仅是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妇女的需要，是十分荒谬的；从此推论出妇女解放必然只能是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性质、必然是反动的，也是同样可笑。但，不能忽略，且须辩证地了解到：改良道路仅仅在辅助的问题上有用，而在根本上是无用的；中产阶级妇运在某些历史时刻及变动中，会出现其进步的一面，我们不是在这方面否认它，而是在动力与前途方面，及其反动的时刻下，去反对它；并且，呈现矛盾交缠之时，也就是借此找出解决矛盾之新可能的时候。

这是答案的一部分，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1995年3月30日立报)